

## 一锅一碗思华年

□祝晓风

话，聊了很长时间。说这是我的精神港湾，是因为这里是完全不同于我原来生活的另一个世界。这个世界的主人和我聊的，大多是我很陌生的另一个时空里的事情，听听，温哥华、剑桥，还有台湾新竹，这些地名离我该是多么遥远啊，简直远在天边。虽然也聊文章诗词，但也和我已经习惯的话语不是一个系统，不是一个频道。主人的言谈举止如此优雅，和我原来认识的人也都不一样，还有她说话，总有旧时的词语，再配上一口清脆悦耳的地道京腔儿，甚至她随手写信、写便条，都是繁体字，而她的身份却分明又是个外国教授。这真是不可思议。这是一种完全在精神气质上的不一样，是从内思想到外在形象的不一样，如同天外来客。——总之，我无法形容这种感觉。

在专家楼叶先生那里，我最早见到从台湾来看叶先生的施淑教授，也是她上世纪60年代的老学生，著名作家施淑青和李昂的大姐。叶先生和她的老学生们之间，那种互相尊重、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，真是令人羡慕，特别是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的大陆的老师们，有过与此截然相反的遭遇后，对此感觉会更强烈吧。

另外，平时只能在书中看到名字的名学者，在专家楼叶先生那里，见到的何止一二。——不夸张地说，迦陵先生给我打开了一个窗扇。因为家严家慈也都是老师，而且是中文系毕业的，他们的同事中，也有叶先生一位最要好的辅仁大学女同学的女儿，这样先生和我就多了一层共同话题。

就这样，自然而然，和先生熟了。有时下午聊到五点多六点来钟，先生就留我在她那里吃饭。第一次，我真是不好意思，毕竟不熟，或去或留，都怕唐突。留下来吧，显然给老先生添麻烦；不留下呢，又怕不礼貌，拂了主人的好意。我相信，刚开始，叶先生也是有客气的成分。

但即使是客气，也是那样一种自然的礼貌，一种让一个晚辈、一个客人感觉到自然、亲切，同时又是受到尊重的客气礼貌。后来我看一些南开校友回忆与叶先生的交往，才知道，叶先生请学生帮忙、跑腿之后，通常会请学生吃一次饭表示感谢的。其实，这也是老人、老北京人待客的常礼，并非对我的特殊待遇。但我那时并不太懂，所以刚开始，不免拘谨。但再拘谨，也是第一次第二次拘谨，第三次第四次，也就不再那么拘谨了。

吃的都很简单，往往都是上一顿她从餐厅买的饭没有吃完的，再放在锅里，在火上热一热，或者放在微波炉里加热一下。有时临时觉得不够，她就从冰箱再拿点儿东西，或者叫我去专家楼餐厅再去买点儿。先生并不刻意，就是有什么吃什么。有时

饺子，有时面条，有时馒头，再配一两个菜，她再熬点儿粥。熬粥是用一个淡黄色的小铝锅，另外有两个小碗和两个小碟子。还有一个稍大一些的瓷碗，有时候也当菜碗，用来盛菜。总之都是家常饭菜。

1992年暑假过后，叶先生要回北美，先是要应孙康宜教授邀请去耶鲁大学讲平弃疾词，然后再回温哥华。临行前几天，我到专家楼去看她。叶先生收拾着东西，对我说，她从去年回国后用的这些碗筷餐具，或者还给餐厅，或者另外处理。只是这只是小铝锅和这只瓷碗，是她自己从温哥华带来的个人物品，她不用还给餐厅，也不想再带回温哥华去，因为行李实在太多。同时她又不舍得扔掉，因为用了很多年，是旧物。她就问，晓风，这个锅和这只碗，你如果需要的话，送给你用怎么样，反正也是咱俩这些个日子一起吃饭用的。

——这就是这一锅一碗的来历。

我当时住南开研究生楼17楼。当年的学生，家境都一般，贫寒子弟也不少，食堂好点儿的饭菜舍不得买；大家又都是20岁上下的精壮小青年，所以普遍吃不饱。而高校里的食堂，晚饭开饭时间普遍太早，都是下午五点还不到就开饭。我们到了晚上九点来钟，就开始有饥饿感，有时晚上饿得睡不着觉。于是，晚上加餐就很普遍。所谓加餐，不过就是在宿舍里偷偷用电炉子煮方便面而已。当年天南大等高校附近，卖电炉子的因此很挣钱。以前我用自己的饭盒煮方便面，总是不得劲。先生送我的这个小锅正正当用，而且又很实用，主要是大小合适。这个锅外形小巧，盖上一个盖儿，看上去圆圆的，很可爱。但它容量其实不小，锅口直径16厘米，算上两边的把手总宽21厘米半，锅深7.5厘米，刚好可以放两小包方便面，还能加一根小火腿肠，有时看书到深夜，需要再打个鸡蛋，也能行。碗也挺漂亮。直径比我原来在家用的碗稍大，但扁平一些，有一指宽的碗沿儿，沿儿上釉着一粗一细两圈儿藏青色的花边儿，碗体却是淡淡的蛋青色，两种颜色搭配起来，朴素淡雅。碗底有几行英文，最后一行是MADE IN CHINA（中国制造），可见是国内出口的，被先生买到。这一锅一碗，在那几年，我不知用它们吃了多少包方便面。

这一锅一碗，后来又从天津跟我来到北京，经历了大小无数次搬家，我一直不敢丢，已经33年了。小锅因为是铝制的，不十分坚硬，有两处凹痕，锅底的漆早已磨光。因为现在做饭都用大锅了，所以这个小锅平常放在柜子深处，很少用。瓷碗最外一圈儿的蓝釉细线有点儿磨损，现在我还经常用它盛粥喝。

## 编者按

清明时节，慎终追远。2024年，我们痛别叶嘉莹、严文明、饶范子、谌容等文化名家。他们生前以不同方式守护文化根脉，滋养俗世心灵。斯人已逝，精神长青。值此清明，谨邀请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祝晓风、考古学家许宏、中山大学教授林岗、文化学者段辉连以文字遥寄追思，愿文脉永续，风骨长存。

## 2024年去世的部分中国文化名家

戴逸(1926年9月10日-2024年1月24日)，历史学家  
谌容(1935年10月25日-2024年2月4日)，作家  
齐邦媛(1924年-2024年3月28日)，作家  
马识途(1915年-2024年3月28日)，作家  
严文明(1932年10月-2024年4月14日)，考古学家  
魏明伦(1941年-2024年5月28日)，剧作家  
邵大箴(1934年-2024年7月25日)，美术理论家  
乐黛云(1931年1月31日-2024年7月27日)，学者  
付林(1946年1月17日-2024年10月7日)，词曲作家  
痖弦(1932年8月29日-2024年10月11日)，诗人  
聂华苓(1925年1月11日-2024年10月21日)，作家  
叶嘉莹(1924年7月2日-2024年11月24日)，学者  
饶范子(1935年2月18日-2024年11月27日)，学者  
童祥苓(1935年3月5日-2024年12月2日)，京剧表演艺术家  
刘家昌(1943年4月13日-2024年12月2日)，音乐人  
琼瑶(1938年4月20日-2024年12月4日)，作家  
谢芳(1935年11月1日-2024年12月19日)，电影表演艺术家



豆包AI



叶嘉莹

(1924年7月-2024年11月)

出生于北京，号迦陵，古典文学研究专家、教育家、诗人，生前任南开大学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，南开大学讲席教授，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。主要著作有《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》《杜甫秋兴八首集说》《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》《迦陵论词丛稿》《迦陵论诗丛稿》等。

又一个春天来了。即使在北京，这些天樱花、桃花和海棠也都开了。看着绽放的海棠花，我不由得想起去年秋天，迦陵先生说，秋天了，叶子落了，我恐怕看不到明年的春暖花开了。想到这些，我不由得潸然泪下。

1991年秋，我因为偶然的机缘，拜识先生（详见2023年11月6日《人民政协报》拙文《初见》）。认识之后，因为要修改文章，要向她请教，去她住处拜访的次数就多了。那时先生住南开大学专家楼一层最东头儿的那间，我一直记得是110房间，去年11月底，我又去看，却是106。今天我查先生当年给我的信，有文字记录，记的是她最初住103，后来的确定住的是106。

这103和106，当年就是我的一个精神港湾。

当年的叶先生，才刚刚67岁。今天看来，正是她状态最好的一段时间。这时的叶先生，既不像她90多岁以后，年高体弱，也不像她六七十年代的照片中那样，比较文弱、文静，目光中时有忧郁；1991年的迦陵先生，精神健旺、精力充沛，体形匀称、步履矫健，一头浓密乌黑的秀发，谈话时总是满面笑容。记得第二次到103拜访她，说话间她到厨房去了一趟，再回来，她就站在客厅房间门口，说着说着，就势倚着门框，接着聊天。我本来是坐在较低的沙发上，这时要站起来，她摆摆手说：你就坐着好了，不用客气；我成天坐着，一站一站舒服。——她就这样微微倚着门框，很自然放松，站着和我说

## “潜心学孔孟，不沾官与银”

□许宏

知识积淀都有先天不足，但具备很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以及自学成才的能力，部分学者能利用特殊的时代境遇仍做出了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”（叶隽：《民国学术丛利总序》）。显然，徐苹芳先生和严文明先生都位列其中，而且属于前述“部分学者”，他们之间的惺惺相惜完全可以理解。

我们这代考古学人，都是读着严文明先生的论著长大的。我199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，师从徐苹芳先生做城市考古，在山东大学任教期间主要从事先秦、秦汉考古的教研工作，徐先生帮我确定了先秦城市考古的学位论文选题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开始向严文明先生请益。1996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，严文明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，俞伟超、张忠培、张长寿和徐苹芳先生为答辩委员。这一答辩团队，被学林誉为“黄金组合”。

此后的数年间，因出版经费迟迟未能落实，修改定稿的博士论文也就一直无法付梓。出于申请出版经费的需要，我曾多次请严文明和俞伟超二位先生为拙著写推荐意见，都得到了二位先生的慨然应允。恩师徐苹芳先生为了拙著的出版更是劳心费神。没有他们的敦诲提携，我的处女作《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》是无法完成和问世的。这些，我都铭记于心，

不敢忘。

比至我接手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，严文明先生又一直关注着我们团队的工作进展。“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”发掘项目，入选“200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，都是与严文明等先生作为评选委员的力荐分不开的。2014年10月，“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”在北京举行，年逾八旬的严文明先生又亲自到场，并作题为《课题意识先行开展多学科研究》的重要发言。在发言中，严先生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。他指出：“要在方法论上有一个正确的把握，要有创造，要有发展。什么是方法论？二里头遗址取得重大的发现和重大的研究成果，跟聚落考古的意识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”是的，严文明先生是中国聚落考古的重要奠基者和领路人，我们的业绩是在他及其他前辈的指导引领下取得的。

由徐苹芳、严文明二位先生分别任组长和副组长的考古学科“十二五”规划调研报告课题组，于2011年初正式推出了《考古学科“十二五”规划调研报告》。本人有幸与赵辉、陈星灿、朱岩石、杭侃、袁靖等师友参与执笔。在和两位先生共同切磋的过程中，受益匪浅。当年5月22日，徐苹芳先生仙逝。这篇报告也成了此类调研报告的绝响。

回到严先生的诗集《浚哲》，

诗稿中，还有一首《二里头之谜》，作于2018年。先生对二里头的发现和争议娓娓道来，言及“人人说西毫，邹衡独不苟”：“如今二里头，当为夏墟丘。此说违众议，遂遭众人毁”，后来“众人遂改口，反认夏墟丘”。面对如此聚讼纷纭、莫衷一是的学术景观，严先生有自己的见解：“搔首再思考，猜谜竟不休：先夏后商说、非夏非商说、有夏无夏说、少康中兴说……中华第一都，不知何所属。二里头之谜，破谜未有期。若不见文字，难解此谜题。一定要破谜，未免书生气。都城大气象，岂是雾中识？”（按：此诗原无标点，标点为引者所加）笔者的一贯表述则是：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，并不妨碍我们对二里头在中国文明史上地位的认知。在这一问题的看法上，晚生与大师之间，也有忘年的身心相印。

其实，读《浚哲诗稿》，能引发共鸣之处，所在多有。譬如严先生感怀道：“平生学考古，鉴古以观今。莫道书生小，常怀济世情！”（《自题小照》）又如，“潜心学孔孟，不沾官与银（页下自注：我曾经自铭曰：一不做官，二不敛财，修身格物，贤哲情怀。）”（《八十抒怀》）。至于“学海无涯生有期，师道不可须臾离。晚生不知黄昏至，朝朝暮暮自奋蹄！”（《七十感怀》），更是吾辈应置于座右，时时加以鞭策自省的。

上人和的要素。这使得暨大海外华文研究大踏步走在全国高校的最前列，做出了最好的成绩。其实当时海外华文研究，在不少高校并不乏人，但由于不能形成合力，后继无人，高潮过后陷于凋零。暨大得饶师经营团队，形成阵地，便枝繁叶茂，持续发展。2002年中国海外华文研究会成立，饶师担任创会会长。她荣休之后，不忘学术，心系通过项目凝聚人心训练人才和栽培后学，主持修撰多卷本《海外华文文学史》。饶师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，实在是一息尚存，鞠躬尽瘁。我略早上大学，在研究机关“野生”多年，归校园之后，虽也顶过学术“带头人”的名号，但终究是“单打”的风格。是我不如吾师者二也。

饶师50年代初负笈省城，她属于现代社会变迁洪流里还保有好的旧学教养的最后一代人。饶师偶尔跟我谈及她的家族、她自己数十年来的风雨沧桑。听过她说的一切之后，令我惊讶的地方是她如何能初心不改，做人处事有自己的守则，好像风风雨雨洗礼在她身上留不下任何痕迹一样。想到她成长、工作的背景，这实在不容易。数十年社会的起伏和风浪，造成“老运动员”的行事风格才是正常的，也是我们在社会行走经常见到的。像饶师那样闲庭信步般对待潮起潮落，那得需要多强大坚韧的内心。我想饶师真正在汲取到了传统人生教养的精华。儒家典籍说的“内圣”，庶几近之。饶师当然不是从“国学”的氛围中育成“内圣”功夫的。从书里得来者浅，从家庭前辈的言传身教得来者深。是不如吾师者三也。



饶范子

(1935年2月-2024年11月)

广东潮州人，著名文艺理论家，生前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副校长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，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。1993年在中国首倡“中西比较文学”方向，并率先倡导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海外华文文学和诗学研究。主要著作有《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》《中西小说比较》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域》《比较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》等。

## 不如吾师者三

□林岗

追随着范子老师的读书三年，如今饶师归道山将近半年。去年夏季远赴外地支教前向饶师辞行的情景还历历在目，今则天人远隔。内心惆怅，略数不如吾师者三，以为怀念。

我在大学浸润多年，看到校园里总有一些教授比另一些教授更像教授。尽管不认识，而一眼望见，可断定必是教授无疑。饶老师就是这样教授。饶师见我们学生，讲课也好，平时在她家闲聊也好，她总是妆容端庄整齐，衣着品位素朴淡雅，装饰恰到好处。而她的讲话，舒张有度，一板一眼，连吐词都是经过斟酌的，让听者如沐春风。在我的心目中，饶师是“女神”般的教授。记得有一回，她还是暨大副校长的时候，带我们几位在读博士去澳门参加学术会议。之前她特意叮嘱我：学术会议是庄重场合，穿衣服不可像平时那样随随便便，要弄得像个样子。这给我很深的印象，令我想到待人接物是中国传统教养的一篇大文章，而成长在“和尚打伞”年代的我，这方面是十分欠缺的。从校园读书出来，也忝列教师队伍，两相比较，高下立判。是不如吾师者一也。

攻读学位，需要好的学术环境和好的学术引路人，而营造好的学术环境和指引学生上路，则需要前瞻的眼光、组建团队的本领和争取得到足够的学术资源。饶师在这三方面都堪称楷模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西方发展多年的比较文学的理念和方法传入中国，那时学术圈里身体力行的人并不多。因为学者做事都有惯性，从原有赛道转入新赛道，需要眼光，需要勇气，需要放弃，其实不容易。然而饶师的反应与众不同。她学中国古代文学出身，那年代自然也没有条件出国留学，但她能敏锐地觉察到中文学科里一条新赛道正在形成，而这就是学科拔萃而起形成自己特色的绝佳机会。她紧紧地抓住这难得的时机并且持续用力，做出成果，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作为新生学科的比较文学的南派翘楚。饶师的做法是将原本烂熟于心的中国传统古典戏曲、现代话剧与西方戏剧进行比较研究，主编《中西戏剧比较教程》于1989年出版，并作为一门课程教授学生。1993年在有了多年深厚的积累后，联合时在深圳大学的胡经之教授申报博士点，一举成功，为学科发展开拓了新的生机。

申点成功固然是难得的开始，而饶师更可贵在于她有学科的忧患意识并且为学科发展持续努力。90年代初期，海外华文研究由于打开国门交流增多在学术圈得到了更多的关注。暨大在这方面有天时、地利。饶师当然不会放过这机会，她的贡献是添点。

员、相声作家、编剧，梁天与葛优、谢园同称“三丑星”，都是名人。我爱人在家做火锅招待梁左、梁天兄弟俩，麻辣烫火锅下啤酒，两个北方小子连说爽爽爽。我还带他们游览了北碚的知名风景区缙云山、北温泉等地，让他们全家感受第二故乡的美景和纯朴乡情。后来，梁天与中央电视台导演来北碚指导拍摄春节联欢节目《缙云春潮》，获得重庆市电视台春节联欢会展播一等奖；梁左帮助北碚区在北京大栅栏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了《嘉陵江风情展》，扩大了北碚的知名度。

然而世事难料。当我再见饶老师时，时光已到2001年底。当时她面容十分憔悴和疲惫，令我一时不敢相认。后来得知她家突遭变故，半年内老伴范荣康和大儿子梁左先后离世，这对她身体和精神打击极大。获悉后，我请她到缙云山疗养。在此期间，我经常约北碚区文友去看望她，希望帮她走出困境。

两三个月后，饶老师下山时，精神面貌大为改观。梁天专程上山来接她时，也对母亲的变化感到惊喜。

这一别又是二十余年，直到去年惊闻饶老师病逝。



谌容

(1935年10月-2024年2月)

原名谌德容，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口镇，祖籍重庆巫山县。生前为中国作协第五届全委会委员及第六、七届名誉委员，作家、编剧。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《万年青》、中篇小说《人到中年》、短篇小说集《太子村的秘密》、中短篇小说集《错、错、错！》等。